

緬甸台資廠的一場罷工：後政變時代，「緬甸製造」的工人困境

仰光產業園區近九成的外資工廠為中資背景，因此，「快點」成了大部分工人唯一記得的漢語詞彙。



編者按：2025年5月，位於緬甸仰光的一家台資鞋廠爆發罷工，約4千名工人在廠內抗爭，要求提升工資。在2021年的軍事政變後，緬甸經歷政局動盪、通膨飆升、電力短缺、強制徵兵、洪水地震等人禍天災，使勞工長期處於飢餓與恐懼之中。仰光作為軍方控制下「唯一安全的城市」，其產業園區為外資聚集地，近九成外資工廠為中資背景。這些企業多半仰賴退役軍警管理員工，並與地方軍警建立密切聯繫，以便在突發事件時迅速介入「維穩」。在極度惡劣的工作環境、資方與軍警的聯手打壓下，爆發了多年未見的大型罷工。

本文為「後政變時代的緬甸工人」系列報導的上篇，走進罷工運動現場，探討緬甸工人近年所面對的多重困境，紀錄他們如何在種種不利條件下團結抗爭。預計於下週刊出的下篇，將梳理緬甸工人運動的歷史脈絡，聚焦工會如何在軍政府統治下普及法律知識、挑戰性別秩序，延續後政變時代緬甸工人運動的火種。

政變後的罷工

「漲薪！漲薪！……」5月14日中午，在仰光萊達亞產業園區，一家台資工廠傳出了這樣的喊聲。最初有十幾人，然後幾百人，不斷有工人放下手裏的活走出車間，加入罷工運動。

這家工廠於2014年在緬甸正式投產，全名為「昌億有限公司」，是阿迪達斯等國際品牌的主要代工廠之一，也是目前緬甸規模最大的運動鞋製造廠，有超過6200名員工。而萊達亞是仰光最早建立也是最大的產業園區，遍布外資背景的製衣廠、製鞋廠；也是仰光的西南門戶——連接目前正頻繁交戰的伊洛瓦底省和若開邦，自2008年納吉斯風災以來容納了大量來自這兩個地區的農業移民和氣候難民。

2021年緬甸軍方發動政變後，仰光的日常被拉回到民主改革前。在長達五年的政局混亂、電力短缺、通貨膨脹、強制徵兵、和自然災害等困境的多重夾擊下，人們比任何時候都疲於生存。而2025年緬甸地震之後，仰光成為「緬甸目前唯一安全的城市」，且房租大漲。軍方為了保住這個「安

全」的名聲，嚴格地把守着通往仰光的鎮區，這些鎮區也是遍布外資工廠的產業園區。在五年的飢餓和恐懼面前，「罷工」變得難以想象。

因此，當昌億罷工的視頻在 Tiktok 傳播時，迅速引起了廣泛關注。「這是曾經熟悉但如今罕見的聲音」，流亡泰國的緬甸媒體《Frontier》如此寫道。這場罷工最高峰時有超過6000名工人參與，成為緬甸自2021年軍方暴力鎮壓抗議活動之後規模最大的罷工運動。

「罷工前我們的月收入只有35萬緬幣左右（約67美元），而所有東西都越來越貴。我們每天5點起來，晚上9點才能回到家，賺的錢還不夠餬口。所以，經過討論，我們決定罷工要求漲薪。」一位參與昌益罷工的工人說。

他們提出的條件是，僱主將基礎日薪從5200緬幣（時值1美元）提高到12000緬幣（時值2.3美元）、將加班費從每小時1600緬幣（時值0.31美元）提高到2000緬幣（時值0.38美元）、將全勤獎金從20000緬幣（時值3.85美元）提高至40000緬幣（時值7.69美元）。

昌億罷工並非孤例。根據《緬甸勞工新聞》六月的研究報告，從五月初到六月底，在仰光多個產業園區都出現了罷工運動，六月至少有25家工廠發生了罷工。參與者和領導者以女工為主。



35歲的瑪欽是其中一位領導者。她所在的製衣廠為一家中資企業，位於瑞必達產業園區，與萊達亞產業園區隔著一條萊河。她回憶道：「我們是週四開始罷工的，沒有好好組織，只是靜坐示威。喊五分鐘口號，休息十分鐘，這樣循環。」他們的罷工主要訴求是將基礎日薪從6800緬幣提高到13000緬幣，以及將加班時薪提高到3000緬幣。

並非所有工人都願意罷工，要麼出於對管理層的恐懼，要麼是擔心罷工期間沒有收入。瑪欽說：「一開始有100多人加入我們。大家都沒什麼經驗，都很恐懼。」

罷工第二天，工人們收到廠方的回應，稱願意將加班時薪提高到4000緬幣，以及將全勤獎從25000緬幣提高到30000緬幣，但基礎時薪維持原樣。

「我們對此不感興趣。大家關心的正是基礎日薪。因為加班費不是確定的，全勤獎也很難得到。」瑪欽說。她認為全勤獎是一種制約工人的手段，用以威脅不願加班的工人，或無法完成指標的人。因此，在加薪之外，她還要求廠方按工作能力來分配工作指標和獎金，「因為有的人——比如孕婦，不應該被分配她們無法完成的指標，然後強制她們加班。」

「到了第三天上午，HR 想驅散我們，說提供擺渡車，讓我們回家。但只有我們自己才能決定我們是否回家。」這一天，瑪欽和同伴們聚集在車間門口喊口號，僵持到中午12點。

「這樣其它車間的人出來吃飯時會看見我們，我們希望他們也來加入。」她說。「那些小孩每天坐在地上吃飯，我也去喊他們加入罷工。HR 一直跟在我身後，以確保沒人搭理我。但我盡我所能呼籲，我對小孩們大聲喊，『這個罷工也是為了你們，為了我們自己。』然後 HR 的人開始拉我，想把我帶走，這個時候，小孩們才都過來我這邊，把我圍起來。」

她提到的「小孩們」，是12歲到18歲左右的未成年工人。儘管緬甸勞工法已經禁止僱傭童工，但廠方以文件造假的方式僱傭未成年人卻是產業園區公開的秘密。至於產業園區之外的非出口行業，因為童工太普遍而不必勞煩造假。

截止截稿，這一波罷工浪潮仍在繼續。7月17日上午——根據《緬甸勞工新聞》報道——在位於仰光瑞比達產業園區的中資企業法拉法拉（音譯）服裝廠內，約300名縫紉組女工發起了罷工，以提出加薪訴求。在罷工的第三天，工廠封堵了入口，以防止她們在廠區內進行抗議。7月26日，中資背景的緬甸法拉法拉成衣廠內，要求加薪的罷工已經持續到第十天。據「緬甸勞工新聞」，一位參與抗議的女工說：僱主說下週一還會在省勞動局進一步協商。我們希望能夠順利，但現在真的很難預測接下來會發生什麼。」

在廠區內進行抗議是後政變時代緬甸工人運動的主要特徵。而這一波抗議潮背後，是後政變年代緬甸工人的經濟困境。



物價與賄賂

瑪欽7年前從若開邦遷到仰光。若開邦是緬甸移工的主要來源地之一。男性青年多前往馬來西亞、泰國、中國等地，女人們則去仰光附近的產業園區，擔負工廠和家務兩份工作。

「當時，去產業園區外資廠上班是一個體面工作。除了養活自己，我也可以給家裏寄點兒錢。」瑪欽說。由於只唸過小學，她很難在市區找到工作，也承擔不了市區的房租，產業園區的工廠和出租屋是最優選項。這些工廠都以裁剪包裝（CMP）模式運行，是典型的勞動密集產業。

2021年政變之後，緬甸政局持續動盪，連續三年通脹率近20%。那時候，瑪欽剛剛成為一位母親，丈夫在3個月之後離開，留下她和孩子。如今，理想情況下——不休假且廠裏訂單穩定的話，瑪欽一個月可以獲得35萬至40萬緬幣（約70美元）工資，包括基本工資、加班費和全勤獎金。這數字看起來比政變前的工資多，但實際價值每年都在下降。如今，她的收入已經不再「體面」，也無法滿足她和孩子的基本生活。

「我一個月的房租10萬緬幣。然後，因為我是單親媽媽，上班無法照顧孩子，每個月給託兒所交10萬緬幣。現在所有東西都在漲價，自己做飯的話，一個人一天吃飯至少也要花5000緬幣，還是不帶

肉的那種。我自己只有週末才會吃一頓肉，平時的菜是豆子、雞蛋或者菜。」即便這樣生活，她每個月還得借錢，「借了又還，還完又借新的，一直循環。」

國際食物政策研究（International Food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IFPRI）一項報告指出，2023年緬甸常見飲食成本比2020年上漲了160%。根據緬甸團結工會（Solidarity Trade Union of Myanmar，在後文中以STUM縮寫出現）於今年5月6日發布的「維生工資」研究報告，目前仰光產業園區工人日薪大多在6800緬幣左右，而95%受訪工人認為這無法支撐生活。由於持續通脹，緬甸食品、醫療、居住、交通、通訊和休閒支出均呈上漲趨勢，只有最低日薪達到12000至17000緬幣，才能滿足工人的基本生活開銷。

在後政變時代，作為外來流動人口的移工還得面臨一些額外開銷。



2019

為加強對人口流動的管控，緬甸軍方成立的軍事管理委員會（State Administration Council，在後文中以SAC出現）恢復了盟執政期間已取消的以戶口為單位、警察為主導的居住地控制系統。一方面，非當地戶籍者必須每隔15-30天到居委會報道，交至少1000-3000緬幣登記費。如果工人要前往報道，需向工廠請假而錯失全勤獎，如果未及時報道，則需要準備一筆錢賄賂；另一方面，針對外地人口，居委會和警察會對出租屋隨機進行隨機檢查。這些檢查通常發生在凌晨宵禁期間，如果被發現留宿未登記人口，也需要準備一筆錢賄賂。

其次，自2024年2月，SAC實施強制徵兵，要求全國18至35歲男性公民和18至27歲女性公民有服兵役義務。大部分工人都在這個年齡範圍內。為避免自己或家人服兵役，工人們得繼續賄賂——每月1萬至5萬緬幣不等，由村裏長老統一塞給徵兵辦公室。如一位緬甸活動人士所言：「現在任何部門都能以『當兵』為藉口，收取賄賂。某種程度上，徵兵法已經成了這些政府部門的主要財政收入。」

在這種情況下，從今年5月開始，仰光及勃固一帶多個產業園區出現了以漲薪為主要訴求的罷工浪潮。

但不是所有罷工都得到回應。工人們可能只得到口頭承諾，或者被強制驅散，或者是罷工領導者遭遇報復。

「儘管最近的這些罷工都是以漲薪為主要訴求，但這只是因為漲薪是最容易動員所有工人參與的因素。實際上，在這些工廠裏，有數不清的用工暴力，遍布每個角落。低薪只是其中一種而已。」

《緬甸勞工新聞》聯合創始人瑪瑞說。該新聞平台長期致力於收集緬甸工人在海內外工作場所的證詞，並定期推出緬甸勞動權益研究報告。

2024年，Business & Human Rights Resource Centre根據《緬甸勞工新聞》的證詞進行了統計和分析，列出了十一種緬甸成衣行業工人在軍政府統治下最常遭遇的侵權行為。包括但不限於：非人道的工作強度與強制加班；不安全的工作環境；騷擾、恐嚇與虐待；基於性別的暴力與騷擾；拒絕批准請假；不公平解僱；對結社自由的打壓；拒絕簽訂正式合同；使用童工；企業與軍方勾結；任意逮捕與拘留。值得注意的是，這些侵權行為不是單獨發生的，而是彼此重疊，然後同時壓在個體的工人身上。



重重疊加的侵權行為

蘇蘇今年16歲，工齡4年。「因為 COVID-19，學校關閉了。家裏很需要錢，我就開始來這個廠工作，然後覺得不想再回學校了。」她目前在一家中資數據線廠工作，廠裏有許多未成年人，大多是在2020年或2021年輟學進廠的。

「HR 會隨便更改我們上班的時長，不事先和我們商量。」蘇蘇說。在她4年的工作經驗中，唯一能接觸的上級是線長和緬籍管理層。中國僱主統稱之為「緬籍幹部」，緬甸工人統稱他們為「HR」。「他們還會代替我們簽加班同意書，說這是給我們賺錢機會，我們應該感恩。但他們從不為我們考慮。有一次我生病了，他們也不讓我請假，要我必須待到其他人加完班為止。」工廠規定，請病假需要持有福利醫院的證明，但工廠離福利醫院有十公里路程，蘇蘇只有一輛自行車，不可能在大熱天往返。當被問及是什麼病，她才說是來月經。痛經無法開具證明，而如果她提前離開，將被算作曠工一天，不僅會被扣除一天的工資，也會被扣除全部全勤獎。全勤獎通常相當於五天工資，沒有工人會想失去它。

根據蘇蘇的描述，整個勞動過程伴隨着經期之外的長期疼痛：「我們生產線要纏很細的線，HR 要我們一直坐着幹活，不能站起來休息。所以很多人不僅腰背痛，眼睛也花了。」

她坦言不喜歡現在的工作，因為「在這裏，我感覺我們被買賣的東☒，就好像我們不是人，也不值錢。HR 只會一個勁兒地催我們『快點快點』。他們要我們快，但給的工資卻很低。很多人都吃不飽飯，營養不良，生病了也要幹活，怎麼可能快得起來？」

仰光產業園區近90%的外資工廠為中資背景，因此，「快點」成了大部分工人唯一記得的漢語詞彙。

由於是未成年，蘇蘇不敢參與罷工，也不敢辭職。「因為我的年齡還不夠，重新找工作並不容易。而且我們目前的政府是軍人，如果 HR 能付錢給警察，他們什麼都做得出來。」她說。感到壓抑的

時候，她會刷 Tiktok，或者聽音樂。她分享了自己在 Tiktok 上看到的句子：「水晶在成為鑽石之前，要承受很多壓力。」必須把自己比作那樣的水晶，必須相信眼前的痛苦是幸福生活的通行證。



瑪欽在製衣廠七年，最快樂的時間是中午和工友們坐在一起，一邊吃飯一邊聊天。她的鬥爭是從懷孕的時候開始的。她說，「我以前也不知道工人有哪些權利，但是懷孕期間我很需要錢，然後我發現本應屬於我的孕期補貼被 HR 挪用了。是工會的姐姐介紹了勞工維權組織的老師來幫我，那個組織後來被取締了。但我是從那時開始學習勞動法知識。」從那以後她主動做起工廠裏的侵權監督者，不過，從廠方的角度看，她更像是「麻煩製造者」。

在這個製衣廠裏，女性工人佔工人總數的90%，大多從若開邦、伊洛瓦底省遷徙而來。很少有人上完高中，最小的未成年，最年長的40歲。如果年齡超過40歲，會被工廠拒絕，或藉故辭退。「因為年紀大的人身體差，做不了高強度的工作，還可能加不了班。」她說。

瑪欽皮膚黝黑，精瘦，沉默時看上去有些慌亂，一旦說起工廠裏的事則語速飛快，能說上半個小時不停頓：「首先，我們廠裏工作環境很惡劣。車間通風不好，加上人很多，還有機器在運轉，氣溫就非常高，廁所也經常堵住，臭氣就在廠房裏瀰漫。大家每天都要吸着那種空氣工作。而且規定必須要有的車間常備醫療箱，裏面永遠是空的。」

實際上，近年仰光周邊產業園區的工廠普遍存在工作環境惡劣的問題。一位中資廠投資人解釋道：「因為緬甸政局不穩，誰也不知道明天會發生什麼，所以沒人願意投錢建好的廠房。」

此外，這些工廠普遍存在羞辱性管理文化。比如，管理人員頻繁地以吼叫、辱罵的方式來驅動工人。瑪欽說：「從早罵到晚，誰還能開心地工作？有的工人一邊哭一邊幹活，我們每天拼命工作，但從來得不到表揚。」

這些辱罵通常來自「緬籍幹部」，他們的職責包括管理工人、為僱主翻譯。一位中國籍技術員說：「緬甸人幹活太慢了，要是在國內早就捱罵了，但是在這裏我們不能罵，必須交給『緬籍幹部』處理。」

「緬籍幹部」也可能面臨外籍主管的辱罵。一位緬籍翻譯剛從一家中資背景的手袋廠辭職，她說：「那個老闆太兇了，他罵所有人，會用很髒的話，我都不好意思翻譯。因為廠裏有很多 Tomboy，他會嘲笑她們『不男不女』。他也罵我們——『到底會不會翻譯？不會就滾蛋』。」



2019

在工廠的角落裏，還藏着許多基於性別的暴力，這些暴力難以被當前的裁決機制所識別和處理，卻給工人們留下沉重的烙印。比如性騷擾。瑪欽提到：「有一個中國組長，女工正在幹活的時候，他經常摸她們的肩膀、手，甚至胸部。邊摸邊開玩笑。」大多數女工在這種情況下會選擇保持沉默，尤其當騷擾者是上級時，她們害怕自己因表達意見而被調到任務艱難的部門。另一種情況是懷孕補助被管理層非法挪用。「社保局有規定，針對懷孕的女工，要在產假期間支付平均工資的70%，以及補貼生產費用。但我們廠裏懷孕的女工只一次性領到28萬緬幣（約66美元）補助，就再沒有了。有的人甚至因為工齡不夠，拿不到產假補貼。」

瑪欽曾向工廠經理提過這些問題，都沒得到過回應，迎來的只是對自己的打壓和恐嚇。「如果讓老闆不開心，比如像我這樣不順從的人，就會被安排去做難的、重的工作，也經常被找各種理由開除。對我來說，這樣對待我也沒關係，因為我懂法律，也知道如何維權，我知道會有工會的老師支持我。但如果這種事發生在不懂法律的新工人身上，他們會產生很大心理壓力，也很容易失去工作熱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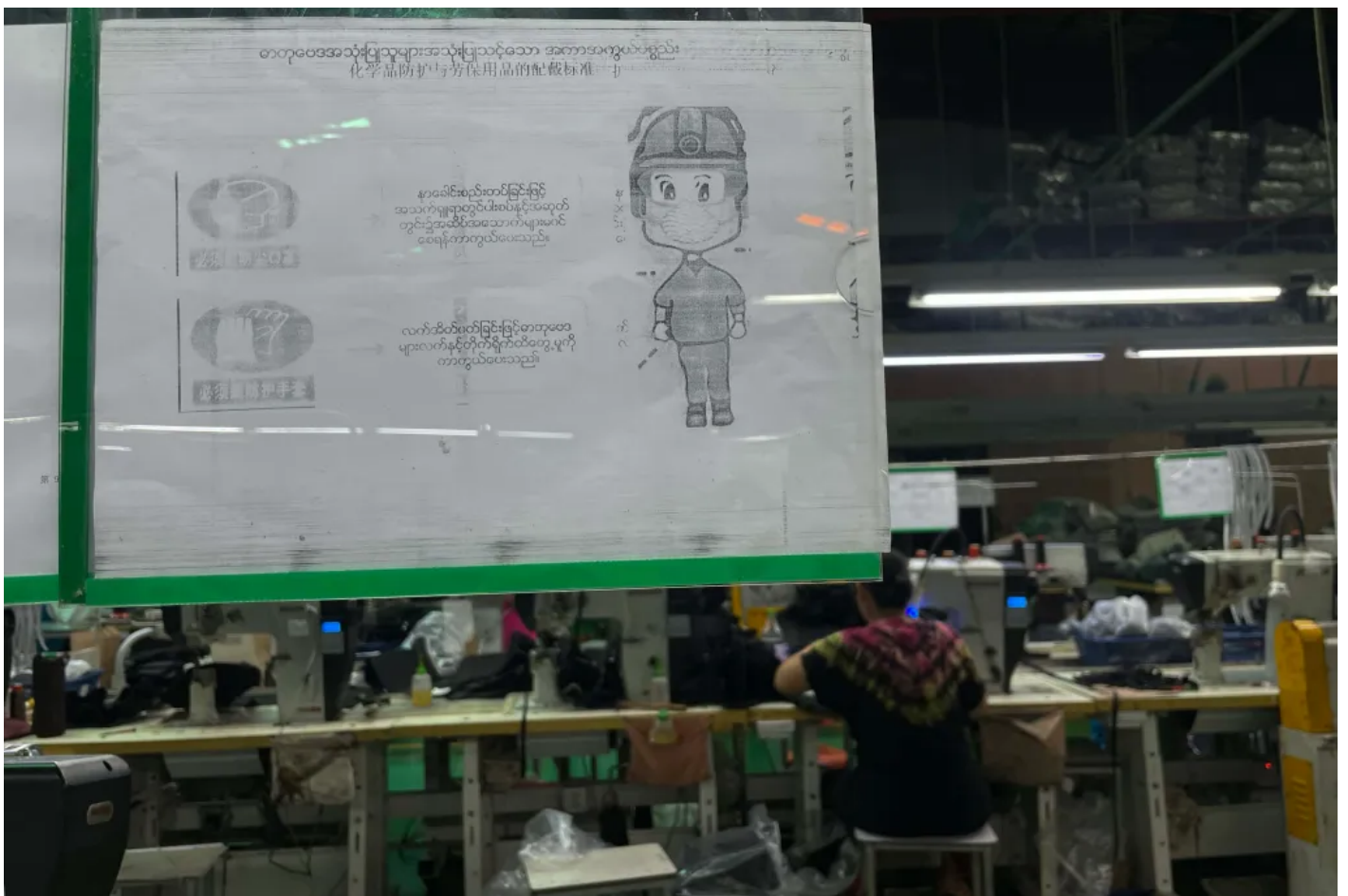
儘管在工廠裏受到打壓，她並不打算離職。「因為我很愛這個崗位。而且，即使我換個工廠，也會遇到同樣的問題，到時還得重新開始抗爭。所以我不如留在這個廠堅持鬥爭。」

由於緬甸勞動法中沒有規範工作場所臨時工比例，以至於臨時工佔比過高成為緬甸產業園區另一個普遍問題。

「甚至一些工廠會只招臨時工。」普法志願者羅西說。她從12歲起在製衣廠工作，至今已十幾年年工齡。2018年，羅西一邊在工廠工作，一邊完成了大學遠程教育，並獲得機會從一名普工升職為一名組長。期間她因為目睹工廠剝削臨時工而參與了當地獨立工會的普法工作坊，從而正式成為工會成員。

羅西認為臨時工缺乏任何保障，面對比長期合同工更嚴峻的剝削。因為「臨時工工資比合同工低，而且容易被開除，容易被迫加班，容易被威脅，容易被砍工資，沒有獎金和社保，在完成三個月試用期後也可能被調到另一個部門重新開始試用期。」2021年政變之後，大量工廠關閉或撤離緬甸，剩下的工廠也只招聘臨時工，導致大量工人失去基本生計。根據STUM主席苗苗艾的說法，當時有大量工廠女工不得不成為街頭性工作者。

為能更好地幫助工人，羅西今年考到了律師執照，但因為內比都的發證機構在地震中嚴重受損，執照還未發到她手中。



秋後算賬

在仰光產業園區，外資廠方對罷工的回應大抵是以下幾種：

首先，是實現「各退一步」的協商。在談及如何面對罷工時，一位僱了300多名緬甸工人的福建商人說：「中國文化講究中庸，不像西方人以非黑即白的方式看世界。我相信，這些工人和我們的目標是一樣的，無非是為了安身立命。所以只要是好好商量，雙方各讓一點，我都可以談。」這時他剛參加完員工的婚禮，已經有一些醉意，充滿自信地補充道，「緬甸人很簡單的，稍微對他們好一點，都會以為是自己早上拜佛奏效了。當然還是有鬧事的人，不懂見好就收，那就滾蛋！」

5月20日，昌益罷工運動結束於這種「中庸」。在反覆談判無果後，工人們最終接受了廠方提出的漲薪方案：基本日薪在5200緬幣的基礎上提高600緬幣（約0.1美元），政府要求的補貼2000緬幣，食物補貼3800緬幣，雜費400緬幣。以此，工人每天能固定獲得12000緬幣。「其中4200緬幣補貼不是基本工資範疇，工廠有權力隨時削減。」瑪瑞向端傳媒解釋。

一位參與罷工的工人說：「雖然比我們要求的少，但這個結果也不錯了。大家第二天都早早去上班了。」瑪瑞指出：「罷工7天，就有7天沒收入，很多工人承受不起。所以只能接受這個結果。」因此，這種「各讓一點」，可能只是工人們恐懼失業的結果，而非懂得「見好就收」的結果。

外國廠商通常會和工廠所在地的權力機構建立良好關係，在出現罷工時以「維護廠區治安」之名在第一時間呼叫軍警。比如在5月16日進行罷工的「天津（音譯）時尚里程碑」製衣廠，在工人與僱主之間尚未開展協商的情況下，已有武裝部隊進入廠區。

因為相信「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或者網傳的「中國人在緬甸是行走的人幣」，也因為2021年3月曾有外資工廠被不明人員縱火，大部分駐緬中國員工對廠外的「緬甸」感到陌生和恐懼，不敢單獨踏出廠區。他們用「鬧事」稱呼罷工，警察的在場讓他們多一些安心，也讓工人維權運動多了一些被動和風險。

外資廠商對「緬甸」的恐懼和不信任也反映在廠內日常秩序構建之中，比如，僱傭退役警察或軍人擔任工廠管理人員或人事部經理。或者，在交貨期加強對工人的監視，「以免他們偷貨。」



無論罷工結果如何，領導罷工的工人都難逃秋後算賬。《緬甸勞工新聞》於5月18日發布的，題為《如何成功發起罷工》的文章，引用了緬甸全國工人聯合會（Federation of General Workers Myanmar，在後文以 FGWM 出現）闡述的僱主瓦解罷工的常見策略，即，「解僱被選為代表的工人、威脅恐嚇、發錢收買、或強制職務調動。」比如在勃固省產業園區5月31日的一場罷工中，廠方只願提高全勤獎，拒絕了其它條件，並威脅「如果繼續鬧事就送去當兵」。在連年內戰的背景下，「當兵」一詞總能讓人迅速噤聲。

秋後算賬和軍警協作也可以同時發生。比如，STUM 一位成員表示，位於雪比達鎮區的一家製衣廠曾於2023年非法解僱了7名提出加薪訴求的工人，隨後該廠部分罷工領導者在回家途中被軍政府逮捕。而這些被解僱或被關押過的工人，從此被列入黑名單，無法在任何一家工廠找到新工作。「為防止這種情況」，FGWM 指出，「最好的辦法就是擁有一個團結統一、組織健全的工會」。這意味着勞工運動不是追求一勞永逸，而是監督的永續。

然而，FGWM 自身，作為在仰光各產業園區具有廣泛工人基礎的獨立工會，已於2021年2月被軍方取消合法資質。同時，其主要成員被軍方以《緬甸刑法》第 505a 條款起訴和拘押。該條款定義的「煽動罪」範圍寬泛，因被軍政府用於打壓異議者而聞名。

瑪欽所在的工廠，在持續四天的罷工之後，日薪從8800緬幣漲到11000緬幣，其中包含加班費和☐品補貼。但她依然處於借貸還貸的循環中，每週只能吃一頓肉。

昌益罷工結束之後，媒體對勞工運動的關注轉移到了其它事件，比如在交戰地帶愈來愈多的空襲導致平民☐死傷。依然有罷工發生，爭取漲薪，或反對以剋扣全勤獎為威脅的強制加班。大部分工廠兌現了漲薪承諾，至少，部分兌現。



雨季的仰光，只需一日暴雨，半個萊達亞都會泡在積水裏。這些水漆黑如鏡面，漂浮着五顏六色的垃圾，圍繞着自建房宿舍和棚屋。這裏被認為是仰光市最大的產業區，租戶們大多是外來務工人員。《緬甸勞工新聞》7月1日的一篇報道稱，整個2025年上半年，產業園區房租都在持續上漲。其中，6月的租房成本幾乎翻了一倍。

而工廠是「水面上的世界」，踏進工廠大門，那裏有良好的地面硬化和排水系統。2021年的「血色星期天」（編按：當天在仰光最大的產業園區萊達亞街頭，軍警以荷槍實彈鎮壓反對政變的抗議者。衝突從中午持續到黃昏，至少65名抗議者當場身亡，其中大多是工人）之後，軍方花了一週時間強制清除位於仰光—勃生高速路附近的非正式聚落——萊達亞最大的「棚戶區」——導致約8000個家庭流離失所。2025年，棚戶區被剷平後留下的荒地被水泥牆圍了起來，裏面正在建設整齊劃一的別墅區。這裏如今是仰光地價最昂貴的地段之一，一塊巨大的全英文廣告牌上，寫着「給未來領導者的綠色家園」。

6月5日，國際勞工組織（ILO）援引其憲法第33條，呼籲對侵犯勞工權利的緬甸軍方實施制裁，隨後被 SAC 指責為「缺乏公正」和「出於政治動機」。7月8日，特朗普宣布將自8月1日開始，對緬甸徵收40%關稅，讓一些中資工廠愈發對將緬甸作為「廉價替代工廠」失去興趣，而將目光轉向越南。

但在仰光的產業園區，仍然每天都有新的失學和貧困的年輕女性，離開農村老家，繼續來到這裏簽下臨時工合同，然後成為一名女工。

（文中所有受訪者名字均為化名）